



巨人

的

诞生

在巨人的背后，
绵亘着一道什么样
的历史与精神地平线？
「毛泽东现象」，
有着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
起源？

萧延中 著

任



巨人

的

诞生

的

诞生

巨人

的

在巨人的背后，
绵亘着一道什么样
的历史与精神地平线？
「毛泽东现象」，
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
起源？

诞生

——“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

萧延中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萧延中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7-210-03156-1

I. 巨… II. 萧… III. 毛泽东(1893~1976)—
人物研究 IV. 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2738 号

巨人的诞生

——“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

萧延中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300千 印数:1—5000册

ISBN 7-210-03156-1/A·27 定价:26.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0791)6898827 电话:6898893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先生的这本《巨人的诞生》，在1988年初版的时候，我曾仔细读过，并纳入了当时我和阎华、廖奔二位先生负责编辑的一套丛书之中。一晃十七年过去了。十七年的历史变迁，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许多事情，但似乎没有改变该书作者的学术追求，他依然孜孜于毛泽东的研究。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学术队伍日渐式微的今天，尚能如此坚持，多少可视为萧先生对倾情选择的精神天空的执著守望。

多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接触有关毛泽东的书籍不在少数。在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学术之作的书籍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生平史实研究，一是著作文本解读，一是思想理论分析。而在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研究著述中，学人们所据的视野和参照也有所不同：或立足于当今的现实需要，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中挖掘有效资源；或依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来考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或着眼于西方“毛学”和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深化对毛泽东的思想个性的理解。后一类著述不多，萧先生的学术选择即为其中之一，或者说是其中的比较突出的一例。而《巨人的诞生》，则是他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时留下的难得脚印。

《巨人的诞生》勾勒的是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风景。巡看这段风景的好处是，能让人体会毛泽东后来的理论和实践那样轰轰烈烈，实在是峰岭有脉，薪传有自。几年前，我的一位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朋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出：毛泽东诗词明显

受到近代诗人诗风的熏染,可惜人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探寻毛泽东诗词黄钟大吕式的英雄气格的来路。细想,他的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于大悲大患中呼唤改天换地,在林则徐、柳亚子、黄遵宪、秋瑾、鲁迅的作品中,是形成了一代诗风的脉络的。青年时代自谓“饱读诗书,尝立志气”的毛泽东,熟悉这些近人的作品,中年以后,也常常引用他们的诗句,在给柳亚子的信中更是直称自己的作品与柳作“诗格略近”。这是从诗词个性而言。从思想个性而言,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却离不开近代以来另一群人的名字,诸如《巨人的诞生》中特别分析到的梁启超、杨昌济等等。

从1910年走出韶山到1918年毕业于湖南一师,大致可视为青年毛泽东“修学储能”(毛泽东语),集中汲取思想学术资源的时期。而从1918年到1921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则是青年毛泽东立足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把自己的选择初步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时期。这十年多一点的经历,对毛泽东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那个年代的有志青年,少有不忧大患,少有不把自己的志向和命运摆在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中来通盘考虑的。而毛泽东和后来的许多著名革命家、政治家不同的是,他的探索,不仅蕴含着改造现实的内在冲动,并外化于某些实践,同时还总是带有浓浓的学理思考,而且这些思考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尤其在如何做人的心性之学方面,甚至还自成一套逻辑。这些,正是《巨人的诞生》用功之所在。作者对青年毛泽东思想逻辑的梳理和研究,读者或许会有不同看法,但要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必要并且具有诱惑力的学术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具备相当宽厚的知识结构才可能去亲近、体会和解读的精神天地。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通常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政治定位势必引出其思想文化定位问题。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各种理论和欧风美雨的文化思潮冲击下,尚未完全西化,中国固有的民族传统包括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仍在起作用。于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思想探索,都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

合,特别是在毛泽东“修学储能”的时代,这种冲突与融合之激烈程度,远远大于此前与此后。此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统治着中国,虽然是“西学东渐”,但最有共识的选择却是“中体西用”;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中国思想界对来自西方的新思潮的欢呼,呈现出无可阻挡的澎湃热情,并逐渐形成比较能够赢得共识的两种基本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及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修学储能”的时候,洋务运动以后逐步形成的在当时中国属于先进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一个传承和延伸的谱系,诸如从魏源、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等。这些人的主张,事实上已成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当时有志学人不可能回避的,总要去咀嚼一番的营养。

因此,要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梳理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并确立他的思想个性,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研究者不仅需要熟悉青年毛泽东在探索中汲取的各种思想资源,同时还要对各种思想资源在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相当了解。如此这般,才能看出青年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进行探索的,他是怎样汲取前人的思想资源的,这些资源为什么能在他身上发生影响,以及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巨人的诞生》的作者选择了一个需要学术勇气和知识积累的课题。

青年毛泽东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知识启蒙是从孔孟开始的,毛泽东本人在1964年还说自己读了六年的“四书”、“五经”,当时“很相信孔夫子”。他在到长沙读书前所能接触进而崇拜的最新思想,则是从郑观应到康梁的主张;对康梁的一些文章,毛泽东后来说“可以背出来”。进入湖南一师之前,他又专门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读了当时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人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哲学、伦理的一批著述,算是在西学方面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启蒙。进入一师后,他又服膺于恩师杨昌济颇有新儒学色彩的伦理主张,还有近代以来的湘学士风,乃至发出“愚

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语。对于国学传统，青年毛泽东更是用功在一般青年学子之上，内圣外王之学和程朱理学，是他津津乐道的。在一师毕业前夕，他读到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禁不住在十万字的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走出校门，青年毛泽东汲取思想资源的视野更为广阔，恰好五四新思潮开始席卷知识界，国外的，从无政府主义（包括工读互助、克鲁泡特金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到列宁主义；国内的，从蔡元培、胡适（特别是胡适传播和倡导的实验主义哲学）到陈独秀、李大钊，他无一不涉猎、研读、辨析。有的，如工读主义和新村主义，他不仅研读辨析一番，还躬身实验一番。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它是如此地纷繁驳杂。但驳杂不是浮光掠影，引为谈资，而是真心投入，倾力融合，由此使青年毛泽东的思考理路虽繁杂却有脉可寻。具体就青年毛泽东在人格道德理论的建设上来说，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一万二千多字的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常有对他当时接触的其他思想资源所作的对照、比较和融合，关于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对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的议论和发挥，随处可见。这些议论和发挥，大多印证着他在伦理学方面的两个鲜明观点：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待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则明显从个体自觉延伸到了群体联合和民主自治，进而表现为他当时激情张扬的“民众大联合”和建立“湖南共和国”的鲜明主张。总体上说，青年毛泽东在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就是世界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什么是“大本大源”，我的理解就是支配历史前进和人生进步的根本规律。当然，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以前，这“大本大源”还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属于客观唯心论的东西，有些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但它毕竟让我们体会到，青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有志青年的地方，是他超越枝枝节节的改良，在思想探索方面拥有着罕见的彻底性。更重要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树立了一个让人感佩的信念：必须

要信奉自己千辛万苦求得的真理，并把它作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完善人生的指导思想。他后来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果然是这样做的。

一个留下如此思想轨迹的青年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对他日后的选择和作为，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每思及此，我常感慨者有二：第一，毛泽东即使后来没有成为一代革命和政治伟人，他也一定会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自己深深印迹的大学问家、思想家。第二，正是在青年时代于求新、求变、求真、求实的思想关怀中养成的禀赋，使他在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行程中能不断有所创新，并成为了中国革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进而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说毛泽东是集几代仁人志士的思想探索成果为一体的人物，当不为过。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萧先生为他的这本书起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副标题——“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

客观地讲，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形而上的居多。我想，这大概也是萧延中这本书写得很“形而上”的一个原因。这本书是一种思想史的写法，并刻着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激情乃至悲情思考的浓痕。今天读起来，或许让一些青年学子感到有些异样，觉得有些表述还可以更平白一些。不过，就我对萧先生的学术旨趣的了解，改也难。好在，大学里的教授，总是要体现自己的学术个性，在研究领域，倘若没有了个性，似乎也难深化学术。

萧先生命我为序，说了上面这些，聊表野人献曝之诚。

2005年2月5日

于北京前毛家湾一号

《巨人的诞生》是1987年的作品,1988年出版,一晃已有十七年了。一本书印行了这么长时间,自然是早已绝版。至今还有朋友记得它,特别是近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老友朱卫东先生还希望能再度印行它,这对我个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

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时期承担了“革命”与“改良”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整体社会心态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前此的几十年,“批判”仍然是社会人文研究的基本特征。记得上大学本科时,我们一帮七七、七八级(两届其实只差半年)的老学生,整天不停地读书、提问、辩论,为刘少奇、彭德怀和张志新等鸣不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欢呼跳跃、摇旗呐喊。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6年法兰西学院授课,分析“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的十年之后,^①我们竟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还有所谓支配思想的“话语”体系的存在!于是,那时总体上说,是在“旧话语”的系统中开拓着“新局面”。所以,在无意识中,道德的勇气比缜密的分析显得更加有意义,并具有天然的价值优势。与这种精神气质(ethos)一脉相承,在文辞的表达方面,于激情满怀、押韵排比的“大字报语体”背后,俨然站立着的却是黑格尔老人那严丝合缝的“三段式”逻辑模型,当然这只是一种机械的简化程式。总之,这是一个试图“革‘革命’之命”的难忘

^① 参阅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时期。另一方面,整个80年代,又是一个久旱逢雨的开放时代,学术信息的增量之猛,翻译、著述的数量之大,“说话”欲望的实现程度之高,也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不禁会让人联系起戊戌维新之学会蜂起和五四思潮之报刊丛林的壮丽景观。这又为90年代以后的学术规范化积累了资源,培育了人才,奠下了基础。当后来意识到曾被某种“话语”体系支配的时候,那旧“话语”的原型立即就变成了某种自觉反思的内在参照系,这无疑已成为知识更新的特殊动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学术成就又成为90年代学术演进潜在的“改良品种”,发挥着思想催化剂的重要作用。

《巨人的诞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习作之一。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当时之所以能印行十几万册,首先是那时的“社会症候”(social symptom)使之然也。它是在我硕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但开始考虑此一专题则是读大学本科时候的事情。1978年,正值“文革”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只不过这次“运动”的对象则是“运动”思维自身。那时人们仍然那么单纯质朴,但在经历了“文革”混乱之后亟需某种心理上的宣泄。说实在的,那时人们讲话似乎比今天大胆,做事仿佛比眼下纯粹。本来因悼念周恩来逝世而遭到镇压的怒气就需要发泄,随着共产党员张志新因持不同政见而惨遭割喉之祸的悲剧被揭露,更使激愤的民情火上浇油。于是乎,原来从小就扎根于心中的那个百战百胜、博览群书、拯救民族的“毛主席”,变得模糊起来。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个人思想为什么会支配整个国家?更加直白地说,那时很单纯,总想搞清他到底“应该”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大学生,我也深深地陷入了所谓“思想的困惑”和“价值的迷茫”之中。再于是乎,就试图凭借自己的朴素的良知去解读毛泽东。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再次捧起了《毛选》。

20世纪70年代末期,读《毛选》不仅已不再时髦,反而成为一种“怪异”的象征。记得当时我重读《毛泽东选集》时(因“文革”时要“天天读”,后来当兵还是“天天读”),不得不在旁边放上一本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书。当有人从身边走过的时候,就用“时髦的”盖住“落伍的”,以掩人耳目。那时研究资料有限,李锐先生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实践活动》就算是最详实的研究著作了。1979年下半年的一天,记得在北京月坛公园对面的一个新华书店里(现在那个新华书店居然还在),发现了一本叫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书。因为当时正在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课,刚好讲到“太平天国政治思想”一节,于是开篇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一下子就映入了我的眼帘。从上午十一点多,一直蹲在书店里看呀看,读呀读,也忘记了吃午饭,直到服务员礼貌地叫我说:小伙子,我们要下班了。当时是穷学生,居然从兜里掏不出那一块两毛五!放下那本既想当下带走又没钱购买的,书,我感慨不已:居然还可能这样想问题!思想史还可能这样诱人!哲学的文辞竟然可能与文学一样美丽!第二天一早逃课去买了这书之后,立即就拿着跟老师辩论,猛烈地抨击“狭隘小生产方式的农民政权”。从此才知道有个“埋藏”了多年的大才子李泽厚。所以,70年代末初期对我影响较大的书就是这两本。它们直接地和间接地激发了我的探讨热情。大学本科毕业时,我那油印的论文《毛泽东早期“湖南共和国”思想评述》,居然获得了优秀奖。那是1982年底的事情。当时,在论文的扉页上抄录着黑格尔的一段话:“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正当的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和目的。”我已记不清这是从哪里抄来的二手货,但今天读来却还真有点在向什么人“下决心”、“作保证”的味道。那时还不知道有伽德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解释学。这就是时代的痕迹。

后来教了一年公共政治课,就读研究生了。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范围是从龚、林、魏一直到毛泽东。要读的书太多了,那时学养深厚的桑威之老师给我们开了一大堆书目,其中半数前此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于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读书、做笔记,只是争辩少了点。到该做毕业论文时,我犹豫不决。我的导师林茂生教

授给我指了一条道。在后来为我主编的一套《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序言里，林老师是这样写的：

萧延中同志曾是我的研究生，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他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又在同一个教研室，接触更多。在读书期间及其以后，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勤奋和多思，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记得当年准备撰写毕业论文的前夕，他提出两个方向：一是从“思维范式”演换的角度，阐述1840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宏观结构；二是从新的角度专题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应该说，这两个方向都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我考虑，前者由于时间跨度大，内容复杂，要求全面掌握史料，当作长期研究的课题自然不错，但在短时期内要取得较大突破，实属不易。而当时毛泽东研究虽已非显学，但作为过来之人，我确知其中分量，况且由于众多原因，那时从政治思想史角度，把毛泽东放到学术系列中予以考察和研究的成果，不算很多，学术空间较大。经斟酌我建议，不要眼高手低，铺摊子太大，最好从资料较分散的毛泽东早期思想入手（当时《毛泽东早期文稿》还未出版），立足于一个点，展开研究。萧延中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他数下韶山，查寻旧报，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八万余字的硕士毕业论文《毛泽东早期政治哲学思想述论》，答辩时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①

后来，现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党的文献》杂志主编、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先生，当时正在编辑“蓦然回首”丛书，得知我有近十万字的书稿，就约我抽看样稿。他略读样稿后，我们一拍即合，

^① 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一卷“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页。

于是就诞生了《巨人的诞生》。由于陈晋是学文论出身，这个带有美学色彩的书名就是他给起的。

今天，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时一个中国普通的青年大学生对“民主”理念的理解程度和基本表述。它既没涉及“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对诸如“多数暴政”这些政治保守主义的常识也没有丝毫感觉，进而形成了“对自身为之献身的价值竟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况。由于《巨人的诞生》写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所以尽管其中存在着诸多明显的主观臆断和化约论倾向，但我也无意再重新改写。封存一份年久的“档案”，自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此次的修订版，我只增添了少许史料，规范了必要的引文注释，其他，包括全书的结构体例和各章节的题目，都一概如旧。

为了弥补旧版知识限制的不足，在文后增加了附录部分，是我近年来的一些论文。其中大部分是提纲性的基本思路，它们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展开论证。

《巨人的诞生》的初版扉页写了两句献词：“献给划时代历史悲剧的伟大承担者；献给我敬爱的导师林茂生教授。”今天，我仍愿将这部小书献给久病之中的林茂生老师，愿这本书能博他一笑，并盼他的身体能够得到康复。关于第一个献辞，看来历史愈久，问题也变得愈复杂，真可谓“知识越多越无知”。如今，我想引用更能传达心绪情结的诗化语言对此略作补充：

悲剧的特有光辉和感奋来自于渗透在悲剧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典型的悲剧英雄，总是处于命运之轮的顶端，处在地面上的人类社会与天空中更为高贵的事物之间。

悲剧英雄向着幻想中的胜利迈开的每一步都在走向他的毁灭，每一步都加强了观众对英雄在劫难逃的感觉。知道或感到这个必然结局的观众完全了解作者并洞悉到戏剧的秘密，而剧中人却并不知情……由于悲剧冲突所表现的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其“悲剧的嘲弄”

(tragic irony) 实际上并不含有对英雄进行嘲弄和反讽的贬意,而只是一种具有无可奈何的事与愿违,其深意在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和对悖论的惊讶和惋惜。^①

当把这第二段引文置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舞台中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惊奇地发现,其实“演员”和“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为一体的。所以,当时过境迁之后,谁也别自夸,因为当时似乎真的没有谁比谁更高明!俗语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至今仍然坚持自己当年信守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理解是批判的前提,研究者的首要责任是反思那个曾经支配着社会事物、包括自我在内的话语体系,透视以往的那个时代“真理叙事”得以形成的脉络(context)以及支撑它可能持续的逻辑。

作者谨识

2004年12月20日夜

于北京

^① 索伦·克尔凯郭尔等:《悲剧:秋天的神话》,程朝翔、传正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3、2页。

以1976年震惊中外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为契机，中华民族那纯朴沉默的理性精神，踏着崎岖凹凸的行程，伴随着伤感、疑惑和求索的情绪，终于冲破了自己设下的传统樊篱，以激昂不羁的曲折形式复归了。说实话，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五四”以后的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历史事件能像这次一样，在亿万人民的心灵中留下如此广泛而深重的巨创，仿佛也没有哪一类激烈的斗争能像这次一样，在方圆近千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骤时积淀下那么多的疑虑与思考。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表面上看是那么的突如其来，可历史的足音中却始终潜伏着无数的根源。自然，这些在深层结构中才能存贮的文化积淀，并非每个人都能说得一清二楚，但是直观的感受、社会的本能及其民族责任感却驱动着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将思维的重心转向到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上：我们的社会有机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由沉默到爆发或许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和成熟。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四人帮”很快倒台，人们在经历了一段真诚缅怀和极度狂喜的交叉情感负重之后，整个民族逐渐沉静下来。他们在想，在看，在思考，在求索，从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反思。

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人治”与

“法制”的争鸣、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经济规律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制度模式的研究……等等，其意义都远远不仅限于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纯粹学术领域，其共同的深刻旨意在于：打破僵死凝固的观念束缚，自己反省、认识、剖析自己，以推动已经落后了的中国赶上世界发展的平均水平。

与以上种种探索相比，对毛泽东进行公正的科学评价，实际上具有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思想解放意义。问题并不难理解，对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设计者和缔造者——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20世纪超级伟人的评价，实际上关系着我们民族今后数十年的基本发展方向，关系着整个世纪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格局。事情愈是至关重要，人们的心理负担也就愈加沉重。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从严肃的会场到街谈巷语，从中国的穷乡僻壤到世界的华都盛市，人们都以各种各样的态度，或沉郁，或激昂，或坚信，或猜测，密切注视着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政治评价。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中国人把这一政治评价看成民族自我前途和命运的关键环节，外国人则把它视为衡量中国价值的重要天平。

在现实的十字路口上，产生了选择的需求。当时邓小平敏锐而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他的这一洞见，不仅是我们数十年来发展与徘徊的深刻总结，而且同时点破了人们为之担忧，感觉苦楚的心理死角和压抑本源。不久以后，中共中央集体讨论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步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政治评价，扫除了围绕在他身上的层层神秘莫测的光环，他又以“人”的形象回到了我们中间。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